



ON ZHENG GUANYING'S FINANCE THOUGHT

# 郑观应 财政金融思想研究

王五一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

ON ZHENG GUANYING'S FINANCE THOUGHT

# 郑观应 财政金融思想研究

王五一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媛媛

装帧设计：周方亚

责任校对：吴容华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郑观应财政金融思想研究 / 王五一 著. —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 - 7 - 01 - 018382 - 4

I. ①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郑观应 (1842—1922) —金融 —经济思想史 —研究 IV. ①F83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0838 号

### 郑观应财政金融思想研究

ZHENGGUANYING CAIZHENG JINRONG SIXIANG YANJIU

王五一 著

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23.5

字数: 312 千字

ISBN 978 - 7 - 01 - 018382 - 4 定价: 69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(010) 65250042



溪江匯清流 道學



著名国学家饶宗颐先生为本书题字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香山之子

容浩然

家國杞憂生

壬午年夏月  
容浩然書

天地結鵠毛

壬午年夏月  
容浩然書

香港特区著名书法家容浩然先生为本书题写对联

# 自序

---

晚清历史上，若以县计，全国一千多个县中，香山出的人物最多，其人物的历史“个头”也最大，香山人的故事自然也最多。几年前笔者曾做过一次单人独骑的自行车“一日五游”，一天之内游五个香山历史名人的故居。从澳门出发，第一站珠海南屏，容闳故居；第二站珠海沥溪，苏曼殊故居；第三站中山三乡镇雍陌村，郑观应故居；第四站中山南朗镇翠亨村，孙中山故居；第五站珠海唐家，唐绍仪故居。一圈串下来回家，骑行五六个小时，香山近代历史人物的“密度”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这现象与澳门有很大关系。澳门开埠比香港早了三百年，作为彼时中西间唯一的贸易枢纽，其经济、政治乃至文化上辐射所及，当然首先是其本县。香山县遂成了当时中国最“外向型”的县，香山人遂亦成了最具“洋气儿”的人，郑观应便是被这洋气儿熏陶出来的诸多香山人物之一。

郑观应诞生于签署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的 1842 年，卒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1921 年。这个生卒年月中似乎隐含着一种宿命力。

除雍陌村的故居外，郑氏在澳门也有家，两个家相距二十多公里，差不多从（北京的）香山到故宫那么远。他一生两边都住过，童年少年时期多居雍陌，成年赴沪闯荡，不回家则已，回家即住澳门。本来，两个家，

无论算哪个，都不妨碍他“香山人”的身份，当时的国人，任凭葡萄牙人如何搅浑水，也没有人不把澳门看作是香山县的一部分。后来沧海桑田世事变迁，香山县改名了中山县，再后来中山县又一分为三，分成了中山、珠海和澳门互不统属的三块，澳门更由原来香山县的“特区”变成了中国的特区。这一分，就把郑观应分成了个跨境人物，中间隔着一个珠海市，北边的中山市和南边的澳门特区都把郑观应看作乡亲，都纪念他。待到郑氏大年头诞忌，两边的官学各界搞纪念活动时，往往是联合举行，日程安排往往是中山一半澳门一半，挺有趣。

桑梓背景若此，可他绝非仅是个香山人物或广东人物，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国级”人物，是中国近代史上与李鸿章、盛宣怀、彭玉麟、李提摩太、孙中山等头面人物交际一圈的历史大人物。

郑观应为人，心地很单纯，但经历挺复杂，一生角色很多，做过的事情很多，求过学、写过书、经过商、做过官、修过道、炼过丹……其一生的“事功”并无很大辉煌。作为读书人，他考过科举，但浅尝辄止，连个秀才也没考上；作为商人，他涉足过许多商业领域，赚了不少钱，见过不少大世面，结交了不少大人物，但从未正经当过老板；他还做过官，并认真努力地给朝廷办过差，出过力，甚至历过险，但这官却是花钱捐来的。<sup>①</sup>

郑观应其实是个一流的聪明人、一流的认真人、一流的正派人、一流

---

<sup>①</sup> 郑观应在《盛世危言》里写有“捐纳”一篇，对清代买官鬻爵一套痛加指斥，这与他自己买官的行为联系起来，很容易产生出自打嘴巴的印象来。而以笔者看来，恰恰相反。一般人买官是投资行为，花小钱捞大钱的行为。虽然一些商人花钱买得的官位是虚职，并无以后通过权力再回本又取利的预设，但他们所求的是地位和名誉，以及由此一地位名誉而可混迹官场上层所带来的潜在利益。而郑观应买官的动机，绝非如此。可以说，他是花钱买事做。为什么要如此？因为郑观应太爱国了。本来，以郑氏之才之德之爱国心，应做大官行大事的，此等人物朝廷不举而用之，乃朝廷之错。此等人物却需自己花钱买官做，恰恰证明了晚清政治之昏暗。观应买官非观应之耻乃朝廷之耻也。

的善良人、一流的热心人，但，他不是个强人。或许，正是其人格结构中的这最后一个要素，妨碍了他在“立功”上成为一个一流人物。

“立功”未尽善，“立德”却很突出。郑氏一门，是出了名的慈善世家，备荒、济贫、赈灾等等，做了许多行善积德的好事。光荣事迹外，他写作的诗、文、书本身也更清晰地表露了他正直、善良、热心的慈善家境界——可谓寓“立德”于“立言”。而郑氏之青史留名，则恰是缘于其“立言”方面的成就。理解到这一层，我们今人读他写的东西，就应当从两个方面着眼：既要读出他的聪明才智来，也要读出他的慈悲善良来。没有一腔爱国热血，仅凭一颗好使的脑袋瓜子，是写不出《盛世危言》的。

说到“立言”，郑氏一生喜欢动笔写东西，无论多忙。虽谈不上著作等身，但作为一个商人，已实属不易了。但却又不能反过来把他的写作看作是业余爱好。其实，从他一生的经历看，不但写作不能说是业余爱好，就是晚年的修道炼丹，也不能说是业余爱好。写作出书是为了救国，修道成仙也是为了救国，如此说他的经商赚钱却反而可以看作是业余活动了。所以，对这个多色彩人物的认识，需要多一点角度。他是一个商人，不唯利是图的商人；一个买办，不崇洋媚外的买办；一个文人，不背亲向疏的文人；一个官员，自己掏钱捐官为国家干事的官员。

在郑氏一生的诸多著述中，其中最著名的，是他先后写的三本书。青年时代写《救时揭要》<sup>①</sup>，中年时代写《易言》，《易言》向《盛世危言》的蛹变，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，到世纪之交《盛世危言》最后一个版本见世时，人已年届花甲。三本书，就反映了他思想演进的三阶段。写《救时揭要》时，应当说他是个绅士，一个怀着慈悲心肠而关心裹足、溺婴、猪仔、赌博等一类身边事的绅士，还没有“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”。

<sup>①</sup> 《救时揭要》于1873年结集出版时，郑观应已年过三十，但集子中收集的那二十多篇小文章，则基本上是在19世纪60年代撰写并已在报章上发表的。

而写《易言》时，他已成为一个国士，一个萦怀于税务、铸银、交涉、债务、国防等国家大事的国士。国家大事本身是成体系的，故《易言》写出来也便成了体系，这与《救时揭要》短文集的杂乱无序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虽然，《易言》的体系没有后来的《盛世危言》完备，但就成体系一点来看，二书应是相通的。郑氏写作，本有“一题多书”“一书多版”的习惯，那么，他在写五卷本《盛世危言》时，为什么要把《易言》的题目改掉呢？回答此一问题的关键就是“商战”二字。如果说《易言》的中心是国家大事，则《盛世危言》的中心就是国际大事，区别恰在这一个“战”字上。到写《盛世危言》时，郑观应已成为一个战士，一个为国家利益而战的战士，《盛》书封面上的“商战”二字，便标志了他的此一新身份。由对身边事的关心，到对国家事的关心，最后到对国际斗争的关心，绅士、国士、战士，郑观应人格成长的三阶段，也由这三本书标志出来。

此“三士演化说”是笔者的发明，但并非穿凿，细读其书不难发现许多证据。以开矿问题为例，在《救时揭要》的“辨洋人新闻纸于中土不宜开金矿论”一文中，谈到开金矿之利弊的时候，郑氏尚认为，在中国本土开金矿，无论是公采还是私采，都有害无益。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青年郑观应眼中，金矿问题，主要不是个国家经济问题，而是个市民社会问题，他反对开金矿，所忧者是它对民风的影响，在于“恐动干戈，废业伤民”，在于“金矿一开，盗贼必取之以饱囊橐”，在于“百姓皆趋于利，不务正业。岂不启民心之乱，为肇祸之根乎？”<sup>①</sup>这是典型的绅士态度。而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写《易言》时，他对开矿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：“夫五金之产，原以供世上之需，若弃之如遗，则在天为虚生此材，在人为弃货于地矣。居今日而策国家之富强，资民生之利赖，因地之利，取无尽而用

<sup>①</sup> 郑观应：《救时揭要·辨洋人新闻纸于中土不宜开金矿论》，载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集·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24 页。

不竭者，其惟开矿一事乎！”<sup>①</sup>已然是“胸怀祖国”的国士之议了。而到了《盛世危言》的“开矿”篇，则更进一步打开了国际视野：“各国之富，全赖矿产。英国矿产最饶，其国亦最富。”<sup>②</sup>“故图富强必先开矿”<sup>③</sup>已是“放眼世界”的战士情怀了。

《盛世危言》先后出了二十多个版本，而且其中许多版本并不是郑观应自己刊印出版，而是别人“私自”翻印，善意“盗版”<sup>④</sup>的。当时有报纸甚至指出了这样的事实：“（《盛世危言》）所载中外各事，中华人近以该书作南针，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。”<sup>⑤</sup>一本普通学人的书竟成了官方科举考试策论试题的题库，成了学子们应试教育的“南针”，这简直与当年的朱熹老夫子有得一比了。这是当时的《盛世危言》热的一个有力的证据。

好友盛宣怀在给郑观应的信中这样说：“弟拟将大著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，……如能因此一开眼界，公之功亦巨矣。”又言，“《盛世危言》一书，蒙圣上饬总署印刷二千部，分散臣工阅看，倘能从此启悟，转移全局，公之功岂不伟哉！”<sup>⑥</sup>朝廷印了两千册“分散臣工阅看”之余，郑观应自己印了500本也很快被索要一空。其时各省书坊自行翻刻印售的，竟达十多万册之多。与其人一生命运多舛形成对比，《盛世危言》却是书运亨

<sup>①</sup> 郑观应：《易言》三十六篇本“论开矿”，载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集·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76页。

<sup>②</sup> 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》“开矿”，载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集·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710页。

<sup>③</sup> 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》“开矿”，载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集·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713页。

<sup>④</sup> 陈树荣：《〈盛世危言〉任人翻刻不需钱》，纪念澳门回归十五周年暨郑观应《盛世危言》出版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，2014年8月14日。

<sup>⑤</sup> 《新闻日报》1897年3月2日。

<sup>⑥</sup> 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文选·前言》，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出版，2002年，第1页。

通，各路政治豪强赏识，思想名流认可，光绪皇帝推崇，甚至，与远在湘潭乡下种庄稼的少年毛泽东也结了缘。<sup>①</sup>

《盛》书之洛阳纸贵，与其时的变法大势有关。郑观应并不是变法运动中的头面人物，但他的书却被时人和后人誉为了“变法大纲”。这或许是因为，《盛世危言》为当时正在努力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的朝野上下乃至整个社会，提供了一本实实在在的“师夷”的教科书；为解决当时的中国的诸般难题，提供了一个整体方略；为变法运动的导演和演员们，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剧本。<sup>②</sup>正如当时的翰林院编修蔡元培所说，“时之言变法者，条目略具矣”<sup>③</sup>；张之洞更指出，“论时务之书虽多，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，择精语详，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。……上而以此辅世，可为良药之方；下而以此储才，可作金针之度。”<sup>④</sup>

除了与变法运动的关系，《盛》书之火与它所出版问世的年月也有着直接关系。《盛世危言》初版的五卷本，于甲午年成书；终版八卷本，问世于庚子年前后。甲午与庚子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大灾年。甲午年败于日本，庚子年败于八国。甲午之败跟着一个马关条约，庚子之败跟

<sup>①</sup> “我读了一本叫做《盛世危言》的书，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。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，认为中国之所以弱，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——铁路、电话、电报、轮船，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。《盛世危言》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。同时，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。不消说，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。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，最后我从家里出走。”参见李锐：《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·读〈盛世危言〉》，劝学网，[http://www.quanxue.cn/lx\\_mao/ZaoDu/ZaoDu08.html](http://www.quanxue.cn/lx_mao/ZaoDu/ZaoDu08.html)。

<sup>②</sup> 中国近代史上“变法”的概念，在狭义上可以仅指“戊戌变法”那件事，从广义上，自魏源提出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，一直到20世纪初立宪派的活动，都是在搞变法。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的变法运动看作一场历史大剧的话，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郑观应看作是此一大剧的编剧（虽不是唯一的编剧），而《盛世危言》便是它的剧本（虽不是唯一的剧本）。

<sup>③</sup> 蔡元培：《杂记》。转引自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文选·前言》，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出版，2002年，第1页。

<sup>④</sup> 张之洞：《盛世危言增补统编·序》。转引自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文选·前言》，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出版，2002年，第1页。

着一个辛丑条约。两个条约中的两笔巨额战败赔款和其他丧权辱国的赔偿条件加起来，复助以愈演愈烈的瓜分狂潮，中国人其时真实地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压力。甲午、庚子两年当然地分别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两大历史节点。而戊戌变法夹在这两个年头之间，构成了另一个历史节点。六年间三块“里程碑”，《盛世危言》就是跨着这样的六个年头，如同在大黑暗中放出的一道醒目的光亮，横空闪耀、一版再版、兴风作浪的。《盛》之时者也！

还应再加一句：《盛》之史者也。《盛世危言》之传世，还在于它是一本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宝典。若将之看作一本史学著作，则它在体例上既非编年体，也非纪传体，而是“领域体”——以施政领域构造篇章。《春秋》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史学史，这种体例可谓独此一份。而其每一篇的内容构造，又大致可一分为三，先讲此领域我之积弊，再讲此领域夷之长技，二者一碰，遂出改革设计。可改者，因其当改；当改者，因其有弊；有弊而当改者，因国际上已有师可法；同时又不忘提醒，师夷是为了制夷。如此，对当时中国各种社会积弊的深入考究和详细分析，便使《盛世危言》当然地成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晚清历史资料库。

另外，对各个领域“夷之长技”的介绍和阐释，也使《盛世危言》具有了相当的世界近代史的史学价值。郑观应虽不是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，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看得最仔细、最详尽的一个。不妨把严复与郑观应作一对比。严复睁眼看世界，走学术一途，通过译洋书以解洋人。而所译之书，多是欧洲人百年前乃至几百年前启蒙运动时期的著作。国人如何可从几百年前的欧洲思想史中窥得眼下之欧美实貌，颇为可疑；彼之国人中有几人有兴趣有知识能读下那八本书来，更加可疑。而郑观应看世界，却是通过直接地与洋人打交道，直接地观察西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来了解西方，在详察的基础上将实情直接介绍给

国人。《盛世危言》一书，凡识中国字者，皆可读，读一点便可了解一点，读多少了解多少，实惠得很。睁眼看世界，严氏与郑氏两种不同的“看法”，孰优孰劣不说，至少应当说各有长短。以此见之，严复的名气似乎不该比郑观应大出那么多来。

百年来研究郑观应的学者和学术不绝，其思想，于时人和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本书之研究，旨在加入此一百年学术河流，为其添上一瓢水。当然，乡人总有乡人的特殊责任和感情，笔者此番以澳门人的身份写郑观应，更添一层意义耳。

以书写书，为解一书而著一书，第一要义当然是要把原著的本义解正确。然而研究《盛世危言》这种独特的“体制外”的思想史著作，又不同于研究一般的思想史著作。例如，如果要写一本研究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的书，则欲要把原著读明白讲透彻，需要把握的，主要是其精神本质和思想渊源，对原著的理解，主要是要去探寻其身前身后思想史本身的来龙去脉，从柏拉图、奥古斯丁、但丁、孟德斯鸠、伏尔泰、狄德罗等思想家的一脉相承的逻辑去串讲。当然，也要结合其时代背景，但那是次要的。不讲欧洲思想史，只讲法国历史，是抓不出卢梭之真谛的。而研究郑观应，历史与思想史的主次地位却要颠倒过来，主要地，不是用中国思想史而是用中国历史来解《盛世危言》。理解这一点，对于本书的阅读是重要的。

本书的要点有三，说书、说史、说理，有点像写文章的三要素——论点、论据、论证。说书是说论点，把郑氏之本义说出来；说史是说论据，把《盛》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和史实依据尽可能地讲清；说理就是论证了，把书和史加以综合阐述，上升到理论高度。可谓循书找史，以史解书，史书兼论。

晚清列强入寇我中华，千万手段，无非抢钱。卖鸦片为牟暴利，开口岸为通财路，兴刀兵为索赔款，割地皮为据利源……而在中国方面，一

切所失，也俱可估值而论，换算为钱财的损失。郑观应正是看到了这一点，何不放下万般，就钱论钱，以商战迎商战——老先生是“钻到钱眼儿里”写出的这些书。当然，不是自家之钱眼，而是与四万万生民利益攸关、五千年文明生死相系的我老大中华的“大钱眼”。这个“大钱眼”，用今天的学术术语说，就是财政与金融。所以，研究郑观应，研究《盛世危言》，其财政金融思想实在应当是作为核心内容而首先加以认识的。然而纵观百年来郑观应研究的诸多学术成果中，财政金融领域恰恰是一突出的薄弱环节。文章粗有三五篇，专著则一本没有。这可能是因为郑观应研究者多为历史学家，专业隔阂所致，导致学术需求与学术供应的此一不均衡。笔者此番愿以经济学客串之身而为史学界行此拾遗补缺之事。

人之本何在？心是也。……天道至公，应物无迹：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。天心也，人心也，人心能合天心，天心自默鉴乎人心也。是故经天纬地，赴汤蹈火，无不由于一心；为圣为贤，成仙成佛，亦无不恃乎一心。三教经书，无非治此心也。此心不治，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，未之有也。<sup>①</sup>

郑观应为《救时揭要》所作序中的这段话，可以说是他一生心地的一个表白。在读《盛》书写本书的过程中，笔者对郑观应这个人生出了深深的敬意，且有一种心心相通的感觉。

“为一身谋则愚，而为天下谋则智。”<sup>②</sup>

王五一 丁酉年三月 于澳门

<sup>①</sup> 郑观应：《救时揭要·序》，载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集·上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4页。

<sup>②</sup> (宋)苏洵：《苏洵集·补遗·审敌》。

自序 / 001

导言 / 003

一、历史与思想史 / 004

二、进步与爱国 / 008

三、商与战 / 009

四、商战与兵战 / 014

五、掠夺与抽血 / 016

六、财政与金融 / 019

七、解书与循史 / 022

001

第一章

财政 / 031

第一节 晚清财政大局 / 033

一、中央集权财政的弱化 / 036

二、财政体系的二元化 / 040

三、财政的外债化 / 043

**第二节 郑观应财政思想中的商战意识 / 046**

- 一、国家财政与国际商战 / 046
- 二、国家财政与国家主权 / 048
- 三、国家财政与国家利益 / 053

**第三节 建设近代化新财政 / 060**

- 一、统一财政 / 061
- 二、公平财政 / 063
- 三、爱民财政 / 065
- 四、廉洁财政 / 069
- 五、节俭财政 / 072

**本章结束语 / 079**

**第二章**

**关 税 / 083**

**第一节 三关并世 / 085**

- 一、常关 / 085
- 二、海关 / 087
- 三、厘金 / 090

**第二节 厘金的财政史角色 / 093**

- 一、厘金经济学 / 094